

WRITERS COLUMN

东方名家

2011·8·15 星期一
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八方论见 · 吴和豪

自由撰稿人

非 常高兴杭州政府把恒毅中学后的道路命名为余廉神父路，让后人永远记得拿督余廉神父的功劳。这让我想起一些回忆。这地方原本是一条小溪，在中学求学时，我曾为了作科学试验而在那儿捉蚯蚓，也曾那儿学人抽烟而被神父处罚。

余廉神父在我的印象中是位树立身教的教育家，每当看到学校周围有垃圾的时候都会亲自去捡，而学生们也会过来帮忙。他时常教导我们要尊敬老人及孝顺父母。神父也时常到学生家里访问，用福建话与家长交谈，让他们了解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况。神父也时常帮助贫困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援助及辅导。

余廉神父毕生奉献华教

神父也乐意与学生们一起学习及交流，与学生们一起歌唱及吹口琴，他最擅长吹奏比利时名曲《风流寡妇》。记得读中那一年，我们是属于第一批学习现代数学的学生，课本上有真子集 (SUBSET)、空集 (EMPTY SET) 及共同集等学习事项。神父对于这些新的学习事项感到非常兴趣，他对我们说虽然他过去没有学过这类的数学，但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他会继续学习这类的数学。

拿督余廉神父是位语言天才，身为比利时人的他懂得荷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华语、福建话及谈米尔文。

恒毅中学后道路名为余廉神父路是令人

鼓舞的，拿督余廉神父把他的一生奉献给华教是令人敬佩的，也是天主教会办学的成功典范之一。

恒毅除了恒毅学校之外，由天主教会创办的华文学校还包括澳洲的圣心中学及修道院中学。这两间中学皆起源于1809年建于檳城加厘路的天主教会亚洲大修院，恒毅中学最早就是建在天主教会亚洲大修院的附近。我在恒毅中学念书时就到那儿作田间训练。

根据文献的记载，天主教会亚洲大修院是檳城最早办华文教育的所在地，最初有11位学生，在学校以客家话学习四书五经及圣经。天主教会对于檳城华教的发展的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观念平台

庄迪彰 《独立新闻在线》
创刊总编辑 (2005-2011)

批评媒体的劣质内容或抵制不肖媒体，是监督及改良媒体的必要手段之一。阅听人面对掌握重型武器的两大对手——国家机关和资本势力，务必掌握可驾驭的手段，才较有可能驱动媒体抵抗国家机关和资本势力，否则所谓「监督媒体」将沦为空话。

今年7月9日的《中国报》夜报封面头条标题《说好的和平呢？示威闹闹市1667人被捕》，招致读者猛烈抨击，甚至号召抵制，另有十个华青团体联署要《中国报》道歉。读者号召抵制的举措是否合理，可从两点来说：一是《中国报》的标题有无不妥；二是从媒体的外部效应剖析阅听人抵制媒体的正当性。

对于第一点，《中国报》在7月13日发表声明辩称，前述标题是个「隐喻」，「泛指各方，包括政府、净选盟和民间社会，都曾表达期望出现一个和平的场面；后来的发展，却非如各方所愿」，「部分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进而产生误解」。

《中国报》的辩解缺乏说服力，是因为前述标题确实偏颇，不是以「不同角度解读」之说足以开脱责任，因为解读和诠释都得契合实际脉络，而非在真空里想像。

首先，只有净选盟2.0宣称举行和平集会，政府和警方素来都把任何非国际认可的集会定调为「非和平」，在净选盟2.0大集会之前，警方甚至跋扈地恫言见一个捉一个，暴力镇压的姿态不言而喻。既然政府和警方从不期望「和平」，「说好的和平呢？」若是一种「隐喻」，其指涉对象就只会是净选盟2.0。

其次，即使单从新闻标题的字面理解，主题「说好的和平呢？」与副题「示威闹闹市」，上下文却有前后呼应之效。「示威闹闹市」指涉的对象是净选盟2.0大集会和参与者，这点不辨自明；既然形容净选盟2.0「闹闹市」，「说好的和平

抵制媒体，是阅听人权益

——新闻自由论衡（四）



此监督媒体全民都有责任。媒体的外部效应牵连层面深而广，因

呢？」自然有指责他们违背「和平集会」承诺之意。

马来西亚的经验说明，非政府组织和在野党号召的群众集会，政府和警方几乎都定调为「动乱」或「破坏秩序」，但集会时所谓「乱」，通常是镇暴队暴力驱散民众，造成民众窜逃、挣扎的场面，媒体的画面和照片却将它「再现」成民众捣乱的样子。读者不齿《中国报》所为的原因，正在于此。倘若《中国报》主事者有放下身段的勇气，刊登道歉启事，也许较能平息不满。

第二点，媒体有别于一般工业商品，它产生的外部效应 (externality) 牵连层面深而广。外部效应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即使没参与其中的人，亦受牵连。

例如，当媒体自觉地力争和维护新闻自由，揭露政府非法截取民众的电子邮箱资讯，进而导致这种侵权行为喊停，保障了民众的隐私权；或是揭露政府贪腐，阻遏了未来可能发生的贪腐，使得纳税人的血汗钱确实用在利惠百姓的地方。这是媒体产生的正外部效应 (positive externality)。

反之，倘若媒体对于官方动辄暴力镇压群众集会的举措批判缺席 (更别说唱和官腔合理化镇压)，将产生纵容警察滥

权、民主萎缩的效果，整体社会都得承担这些恶果。这是媒体产生的负外部效应 (negative externality)。

利益相关者不限于阅听人

报业 (或其他媒体) 与一般商品的另一个差异是，它在二元产品市场 (dual product market) 中营运——既生产和出售报纸，又经营广告业务。报社为了赚取利润而把报纸的空白页面出售给厂家刊登广告之际，实际上也在把读者出售给广告商。报社经常以大篇幅吹嘘销量第一或读者人数最多，在益企益的正是能以销量及读者人数之多吸引广告商以及调涨广告费率，让利润极大化。

至此，显而易见的两点是：首先，就媒体的外部效应而言，公众而不只是读者，都是媒体的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他们自觉地承担监督媒体的责任，既是维护自身权益，也是维护整体社会的福祉。更何况，当报纸把净选盟2.0大集会影射为非和平集会，等于也把参与集会的读者归类为捣乱者，岂有不能抗议之道理？

批评媒体的劣质内容或抵制不肖媒体，是监督及改良媒体的必要手段之一。阅听人面对掌握重型武器的两大对手——国家机关和资本势力，务必掌握可驾驭的

手段，才较有可能驱动媒体抵抗国家机关和资本势力，否则所谓「监督媒体」将沦为空话。

其次，读者作为报社「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对于报社的生存乃至赚取暴利，居功厥伟。就此意义而言，读者作为利益相关者之地位，更是不在话下。

读者号召抵制《中国报》之后，有些维护《中国报》的言论质疑，开设面子书网页号召抵制的「网民」并非掏腰包买报纸的「读者」，大有非消费者无权发言之意。理解了媒体外部效应的影响层面，以及阅听人乃媒体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就不难发现，这种回应十分合理。

其次，即便号召抵制《中国报》的「网民」没有掏钱买纸本《中国报》，而是到《中国报》新闻网阅读，他仍具有读者的身份；而且他登陆《中国报》新闻网，亦使得报社能以网站的流量作为游说广告商在新闻网上刊登广告和为广告定价的依据。据此而言，「网民」的利益相关者地位，与报纸的读者无异。

1995年大选，我以《星洲日报》记者的身份在檳城采访竞选活动，亲自见证《南洋商报》刊登《林吉祥做梦也想当首长》的造假新闻丑闻，事后在《星洲日报》言论版发表《报纸把公信力当赌注！》一文，一名资深记者随后撰写《致庄迪彰公开信》回应 (1999年5月30日，《星洲日报》言论版)，有一段文字十分契合本文主旨：

「建立公信力是有良知的新闻从业员所追求的目标，当做不到这一点或不能做到这一点时，你只好寄望群众走向不惑，挑战媒体公信力。对一个投身新闻行业的人，讲这样的话毕竟是件对自己很残忍的事。但是，如果庶民不醒觉，谁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都辨别不了，那却是个更大的悲哀，对有心建立传媒公信力、期望政党政治也有公信力者，那会是个更长久的挫折。」

16年后重读这段文字，仍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 (不晓得，已高升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的作者，以为然否？)